

黄明信先生永远激励我们奋进

萨仁高娃

黄明信先生修成正果、步入天界近一个月时间了。自2017年6月2日上午在北京濛濛细雨中目送先生最后一程至今，先生音容笑貌常浮现在脑海里，总想着以什么方式表达对先生的缅怀。

其实，我与先生的接触并不多。我2002年7月入馆在少数民族语文组（以下简称“民语组”）工作时，黄明信先生返聘十年后于1998年退休也已有四年。因此，我没有和民语组部分老师一样能有幸与先生共事，也没有太多机会能直接聆听先生指点。但，黄明信先生是我入馆时的考官，编目工作当中的导师，援藏期间的灯塔。

黄明信先生是我入馆时的考官

2002年，新毕业生应聘入馆时并不像现在一样通过馆里统一考试，而是根据部门要求，科组可对拟聘毕业生采取针对性的业务考试形式。2002年春天起，我开始找工作，考虑到国图民语组已经有了蒙古文编目人员，我就把简历投到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（当时合为采编部）的东文图书采编组（简称东编组）。顾名思义，这是着重采访和编目除中国之外的东亚各国语言文字图书的科组。刚走出校园时，自认日语水平尚可，可胜任日文图书的采访和编目。

简历投过去没过多久，有一天BP机（当年手机还不够普及，BP机为主要流动通讯设备）响起。回电话过去，接电话的是现民语组组长全桂花老师。她说在东编组看到了我的简历，民语组刚好缺藏文新书编目人员，根据简历上的信息，她觉得我很适合在民语组工作，就把简历带到了组里。我硕士时候跟随导师的研究方向，学了藏文，在简历上突出了这一优势。

^① 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古籍馆。

全老师约我到组里面谈。我喜出望外，按约好的日子到了民语组，面对面谈，当时情况很融洽，嘱咐我回去后好好考虑一下，我当场就表示很愿意到民语组工作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全老师呼起了 BP 机，回电话时间：“考虑得如何，还一如既往地想到民语组吗？”我回答：“是的，不改变主意。”全老师说：“那改天过来考试一下藏文。”一听考试，虽然有点懵，但也不知是什么样的考试，无从准备。

考试那天，还是在民语组，放电话机的共用大桌子上，全老师递给我考试题，说是黄明信先生出的试题。记得是两叶长条书上的藏文复印件，让我翻译上面的内容，具体内容现已不记得。就我当年的藏文水平，很难一眼就能翻译出来，便翻阅随身带的蓝皮袖珍《藏汉字典》（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编，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6 年出版），逐字翻译，翻译完后，整个组合起来不知何义，就那么提交了答题卷。

之后，又经过当时善本特藏部（现古籍馆）主任和人事处处长的面试，转眼到 7 月中旬，较为顺利地进入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少数民族语文组工作。工作后，全老师透露，当时对我的答题，黄明信先生的评价是“字面意思都翻译了”，言外之意，和我自己感觉一样，内容深层意义没能翻译。但，黄明信先生根本没说后半句，可能不想为难我这个刚刚走出学校、面临就业的学生，特别是对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一种包涵宽厚的态度吧。因此，黄明信先生对我入馆并在民语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做了一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考官。而我，今生能够做一回黄明信先生的学生，接受他的考试，应是前世的造化今生得到的回报吧，永远不会忘记。

编目工作当中的导师

入馆后，我主要负责民语组藏文新书的编目工作。因图书馆编目系统无法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原文的输入，像蒙古文、藏文、维吾尔文等书，题名均需拉丁转写。在编目系统中，藏文拉丁转写，基本无障碍。

那时，黄明信先生偶尔到组里，推门进来后基本都坐在靠门左侧第一个办公桌那里，那是他还没退休前的座位，组里一直没有动，更没有撤。他坐在那里，话不多，拉出办公桌抽屉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组里熟人时不时和他开个玩笑，也有请教问题的。他有时也向我们询问使用电脑的一些情况。

有一次，见他到组里来，我就把系统中转写的藏文字母请他看了看，请教有无问题。他认真地，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，一行一行地看，最后说：“没有问题，就藏字母‘ɑ’，可以用你现在使用的‘h’，也可选用学界较为普遍使用的‘v’。”他既没说错误，也没说让我修改。黄明信先生给人提出建议，总是这么缓和，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。为与学界一致，检索能够更顺利，我将之前编目的转写字段均调出来，将之前转写“ɑ”用的“h”均修改为“v”。这是黄明信先生在工作当中面对面指导我的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。当然，黄明信先生在藏文古籍编目方面所做的规范条例等，至今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工具书，遇到问题总要翻阅它。



图 1:2009 年 7 月 13 日 11 时，作者与黄明信先生在国图民语组合影

2004 年起，我到善本特藏部敦煌文献组工作，见到黄明信先生的机会变得更少。虽然，当时还经常回民语组帮着编目藏文新书，但几乎见不到黄明信先生的到来。以致 2007 年 12 月，《黄明信藏学文集》出版座谈会暨黄明信先生诞辰 90 周年庆祝会上，我也未能到现场服务。直到 2009 年 7 月的一天中午，我有事去民语组时，恰好遇见黄明信先生也在组里，已 92 岁高龄的他谈笑风生，精神状态好极了。组里年轻同志纷纷与他合影，我也有幸与先生合了一张影（图 1）。这是与先生近距离拍的唯一一张合影。

援藏期间的灯塔

2010 年 8 月起，我作为文化部第六批援藏干部到西藏图书馆工作，为期三年。临行时，国家图书馆领导鼓励我：“黄明信先生在甘南拉卜楞寺苦修八年，精通因明学，掌握藏族历算学，艰苦岁月造就一人非凡成绩。愿你凯旋！”援藏，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，并与当地同

事和谐融洽地工作，在岗位上做出应有的成绩来，对我而言，似乎并非很难。并且，三年，比起黄明信先生的八年，更算什么呢？！

为了解黄明信先生在拉卜楞寺的生活，也查阅过相关书籍，尤其是2011年出版的《黄明信拉卜楞寺研究论集》，虽为黄明信先生有关拉卜楞寺的专题论文集，但先生对拉卜楞寺的生活基本轻描淡写，从未说过多么艰苦，更没有抱怨，凡事很乐观，更是淡然。谈的更多是拉卜楞寺的建设、对住持的敬仰、喇嘛生活的充实。有了这种心境，这种精神，想必黄明信先生世界里从没存在过困苦、孤寂、艰难吧。凡事接受了、面对了，就变得快乐了，日子也过得快起来，就像我援藏三年生活和工作，回忆起来，快乐多，收获多。但因远离亲人，时有迷茫，不知所措时，总是想起黄明信先生的八年拉卜楞寺生活，无形中，黄明信先生在我援藏三年期间，如灯塔般引领了我向前。

2013年8月，援藏结束回到古籍馆工作，几乎每年都去看望黄明信先生。最初他躺在自己小床上，翘个二郎腿，悠闲自得地和我们谈笑。2017年1月19日看望病榻上的先生时，已经消瘦了很多，话也少了，基本是闭目养神状态。是啊，黄明信先生一生经历丰富，迎来百岁之时，需要静静地休息了……



图2：2017年6月2日上午，古籍馆民语组新老同事送别黄明信先生后合影留念

现在，黄明信先生离我们而去，相信先生在天国开启了他另一段航程，开辟了他另一片天地。先生乐观、淡然的处世态度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进（图2）。

2017年6月22日

（原载《中国藏学》2017年第3期）